文明转型书系之五/文明史系列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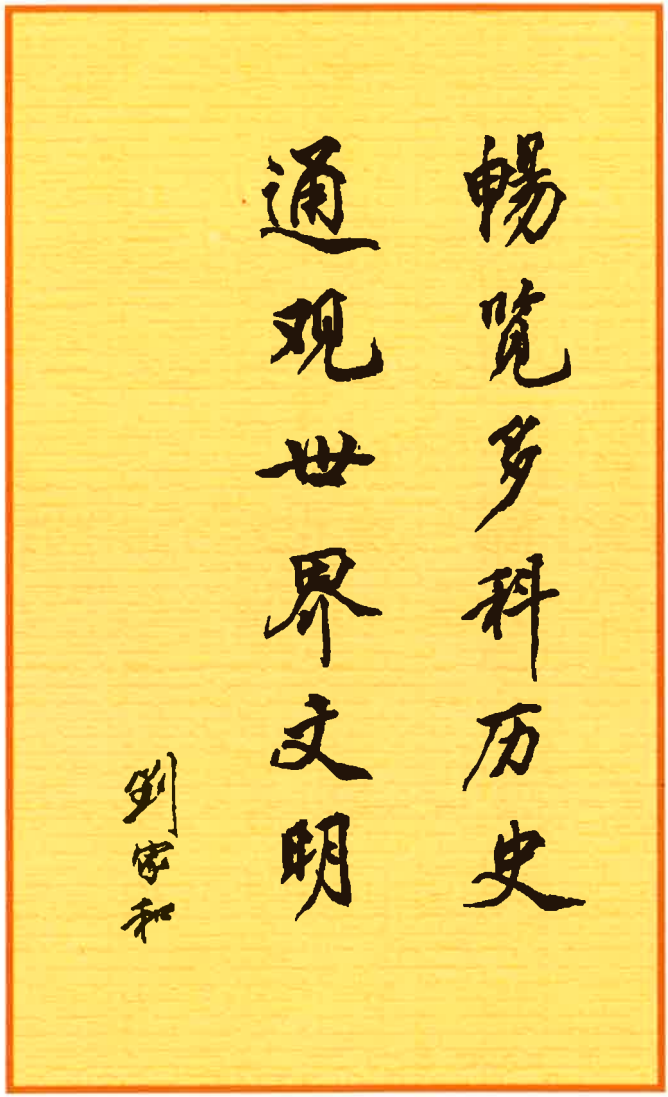
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编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

经济史

王大庆/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题辞

汉代漆器

刀耕火种

宋代交子

战国货币

清明上河图(宋代)

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

万隆会议

文明转型书系之五 / 文明史系列读本

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编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

经济史

王大庆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史/王大庆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文明史系列读本)
ISBN 7-216-04932-2

Ⅰ.人…
Ⅱ.王…
Ⅲ.经济史—世界—通俗读物
Ⅳ.F1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5987号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史　　王大庆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2.5
字数:62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932-2
丛书总定价:135.00元(全24册)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总　序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文化，进而有了人类的文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类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又是怎样创造、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这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不断探究的问题。

人类起源是连绵数百万年甚至近千万年的过程。尽管人类起源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身的起源问题已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人是自然发展、进化的必然产物，同万物一样，人类亦是自然之物。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严格地说，用双手制造工具这一独特的文化创造能力，才真正使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转变的这一生物、文化的进化过程。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脑容量、外貌、体态仍在不断进化，从而由猿人进化到智人，再进化到现代人。在从猿到人转变的整个过程中，会制造工具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高等动物的标志。人类是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制造工具和觅取食物的劳动过程中，开始了文化创造、文化累积和文化传递的活动；与此同时，人类又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了自身的体质。

人类虽然来自于动物界，但却高于动物界。人不仅会劳动，会制造工具，还有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会思维、有语言（语言是表达思维和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有理智、能创造并传递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在其生物体进化的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在不断地进化、提升。所以，古代贤哲认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因为理智同别的一切比较起来更合乎人性”。人类诞生以后，由于生存、劳动的需要，彼此就结成了

一定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所以人又是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是一个道德主体”、“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就是人的社会性。

可见，源自动物的人，不同于作为一般动物的野兽。然而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社会责任心、道德修养的程度又决定了这个人是圣贤还是败类。没有责任心和道德心的人会比野兽还残忍，因为他可以用理性作为工具去肆意实施他潜在的兽性；反之，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社会道德不断修炼自己的人却可以成为圣贤，因为他也可以用理性作为工具去更加完善他的人性。

当人类在其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达到一个先进的水平时，即达到一种开化的特定阶段时，如人类有了文字、公共建筑、社会分工和分化、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专门的科学、艺术、哲学、体育、思想、道德、风尚、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等，就标志着文明的到来。文明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物质因子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当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作用于自然界的物质世界时，就汇合成了这一民族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明，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它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民族文明的认同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

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改造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同时认识了人类自身，并不断地升华了自己。因此，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的发展史，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奋斗史。

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从远古文明直到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总是不断地向前演进。

人类在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自己的互动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分散走向整体，丰富多彩，斑斓多姿。

从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时间向度来看，人类经历了古代文明、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及后现代文明；从空间的向度来看，先后出现了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罗河文明、希腊

罗马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非洲文明、中南美洲印第安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从文明的内涵来看,有物质的、精神的,其表现为有器物的、制度的、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学艺术的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恢宏、灿烂的图景。

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所谓多样性,是指各文明有着不同的类型,如中国文明属于主体内向型,西亚、北非、南亚文明则属于多元重叠型,地中海文明属于外向辐射型。所谓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于有的文明发展中断,有的文明却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

各文明的发展是互惠和相依的。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各民族之间既有自身文明的输出,也有对他民族文明的吸纳和扬弃。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这种吸纳和扬弃中,在弃恶从善的搏击中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并不断向高层次的文明发展。

文明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全的。世界上没有单一的物质文明,也没有单一的精神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当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尤为重要,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会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并引导物质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文明发展史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有理性、有意识、有责任、有道德。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史的推动者。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自我"认识程度,源于人的"自我"精神的自觉。人类精神的觉醒程度与文明史的发展是同步的、互动的。

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缺一不可。人类在对物质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其精神需要的水平也在同步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对自身和宇宙的了解,必然对物质建设起着推动作用,从而又使人对物质的需要进一步得到满足,对精神的需求也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准。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人对自身及宇宙的了解就这样同步互动,并循

环往复，不断提高。

不断提升人类的自我意识，可使“主我”和“客我”更趋于一致，才能使人这一行为主体和权利主体——文明史的能动主体，在人的自我与文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作一个“赞天地之化育”的自觉的、真正的人，才能更好地推动文明社会的持续前进。

人类的“自我”意识或人类的精神觉醒是如何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提升的呢？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人类在经历自己的童年、青年、壮年的过程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及在人对自身内部结构和人的本质的了解中，经过不同层次的反省，不断走向达到自身的精神的自觉。然而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它还将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而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层次。

《文明史系列读本》不是学术专著，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史教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科普读物。

它不是一部整体综合性体例的著作，而是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若干个侧面，按专题叙述文明史发展进程的系列读本。

它力求在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在文风上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给读者以知识、智慧和思想的启迪。

最后，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献给读者：

“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

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关心这项事业。

编　者

2006 年 12 月

目录 MuLu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
——经济史

概　述 / 1

一 前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生活 / 6

1. 石器时代的经济 / 6
2. 初民的社会生活 / 10
3. “农业革命”和文明的产生 / 12

二 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生活 / 18

1. “轴心时代”与经济伦理问题的探讨 / 18
2. 中国封建经济的繁荣 / 29
3. 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异同 / 38

目录

三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 / 44

1.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 / 44
2. 工业革命 / 49
3. 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互动 / 53

四 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生活 / 58

1.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实践 / 58
2. 信息革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 63
3. 当代世界经济的特点 / 65

五 展望未来 / 68

参考文献 / 70

后　记 / 71

概　　述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经济生活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的采集和渔猎经济，传统社会的农耕、畜牧和养殖经济，近代社会的工业经济。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信息和高科技经济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的第四次飞跃，那么这将成为第四个发展阶段。不过，如果说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东西方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那么仅仅是一部分发达国家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阶段，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还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这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日益加剧的趋向。

在人类产生之后，曾经渡过了长达几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只是到了大约一万年前，才进入到文明时代。在那个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工具仅限于打制或磨制的石器，主要依靠采集和渔猎谋生，生活朝不保夕。采集植物果实的工作主要由女子来承担，男子主要负责狩猎或捕鱼，由于前者比后者能够获得更稳定和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曾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几百万年当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变化极其缓慢，为了生存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不断进行迁移，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是如此有限，一次小小的自然灾害就可能给整个部族带来灭顶之灾。因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平均寿命和人口的增长都处在一个极低的发展水平之上。

不过，尽管十分缓慢，新的生产力因素以及随之产生的发展潜

力还是萌生了。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随着全球的气候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温暖和湿润的时期，发生了一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尽管人们对于这场革命发生的动因和具体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妇女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采集植物果实的过程中，由于逐渐熟悉了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的生长周期和过程，人们发现可以通过种植植物的种子获得更加稳定和有效的食物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原始农业产生了。这一时期，至少出现了三个独立起源的农业中心，即西亚、东亚（主要是中国）和中南美洲，这三个中心最早培育出了至今仍然是人们的主要粮食品种的小麦、稻谷和玉米。人类开始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经历了由攫取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的过渡。这是人类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第一次重大的胜利，从此，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在获得了足以养活更多人口的稳定的食物来源的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创造和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一场革命——定居的生活方式，手工业和商业的起源，金属时代（先是青铜器后是铁器）的到来，阶级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起源，人类精神的觉醒……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这场农业革命中找到其开端和源头，一言以蔽之，农业的起源孕育出了最初的文明，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那场革命的创造物当中，是其受益者。

农业起源后，文明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那些农业中心附近开始出现，按照时间顺序，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文明包括古代西亚、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即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如果加上在古代西亚和埃及共同孕育之下而产生的古希腊文明及其后继者古罗马文明，可以称为“六大文明古国”。中南美洲的文

明虽然起源较早，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影响，一直处于孤立和封闭的状态，直到近代欧洲殖民者到来打断了其正常的发展进程之后才为世人所知，但很快就被毁灭，因而，中南美洲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文明最初都发生在一些“点”上，而且大都经历了从小国寡民到地区性的王国再到跨地区的大帝国的发展过程。同时，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类的活动区域大为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虽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某些地区和一定时期曾经出现过十分繁荣的局面，但是这些古代文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可以说，农本经济是前近代所有的传统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尽管东西方古代经济在地区特色、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上千差万别，但还是存在着统一性，从文明产生之初到公元 1500 年，世界上各个文明和地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是大致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其中，与欧洲的古代文明相比，东方的古代文明不论在产生时间还是发展水平上都处在优势地位，尤其是中国，不仅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惟一的一个没有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而且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峰，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创造于这一时期的科技成果“四大发明”为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 1500 年前后，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起源，东西方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一致性和东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开始逐渐被打破。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体系的建立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彻底地打破了各地区的相对闭塞状态，世界越来越连为一体，这些都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版图。在这一过程中，东方的古老文明都无一例外地相继衰落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

势不可挡之势冲击、破坏和改变着东方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古老文明的社会基础、生活方式和思想信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如何通过富国强兵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成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共同任务。

以中国为例，在经历了中国封建经济的颠峰之作“康乾盛世”之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对外政策也日趋封闭和保守。不久，西方列强便蜂拥而至，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古国的大门。1840年，中英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在“洋人”的步步紧逼下，虽然也不乏奋力的抗争，但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毕竟，在日渐发达的工业文明面前，中国恪守着农业文明的制度和传统，它的落后与不合时宜暴露无遗，中国社会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有紧跟现代世界发展的步伐，只有使国家富强起来，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了近百年的摸索和革命斗争的实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彻底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束缚，从此走上了国家独立和富强之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走入正轨，这个觉醒了的东方巨人正在以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再次步入世界强国之林。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近两百年走过的道路也是近代众多发展中国家走过道路的缩影。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列强苦心打造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斗争中日益崩溃，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富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也正是在这一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反压迫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只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和革命，走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转

型，才能处于不败之地。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模式，但是尽快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路。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转型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很多国家来说，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还仍然处在艰苦的探索和尝试当中。

西方国家较早地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其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减慢。进入20世纪，各新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激化，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场规模空前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也正是在两次大战期间，一场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也在悄然酝酿。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是美好的，但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也往往成为新的科学技术的催化剂，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汽车、飞机和电脑，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二战以后，以信息、通讯、电子计算机等产品为标志的智能高科技经济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再一次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思维习惯，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第三次浪潮”产生的冲击波正在迅速地在世界上各个角落扩散，它标志着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开始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迈进。但同时，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平，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也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坚守“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寻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成为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 前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生活

1. 石器时代的经济

所谓“前农耕文明时代”，指的就是通常讲的“史前时代”或“原始社会”，在那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作为谋生的手段，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另一方面，虽然有了一些文化上的创造活动，但还没有发明和使用文字。因此，要想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是没有什么文字材料的，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遗址、遗迹、化石和遗物。这样，与文明时代的研究不同，古人类学、古地质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这样一些相关辅助学科在史前时代的研究中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史前时代长达两三百万年，如果加上人类自身进化的历史，可以达到上千万年，而文明时代不过 1 万多年。在这 1 万多年中，农耕和游牧文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生活方式。到了公元 15 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陆续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因此，从时间上看，我们的文明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不过，从文化创造活动留下的资料来看，文明阶段在数量上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文字的发明和运用使保留人类记忆并向外传播成为可能。因此，面对时间上如此漫长的史前时代，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可以说相当贫乏，少之又少，但是人类探索万物起源的冲动和热情却并未因此而消减。随着近代以来古人类学、古气候学、古环境学、分子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

迅速发展，人类探索遥远过去的能力以及解决未知之谜的希望反而增加了，新的进展不断出现，新的理论纷至沓来，因此，我们还是有能力对先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作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早在18世纪，一个法国学者就把早期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分成渔猎、畜牧和农耕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这一划分现在看来是十分粗糙的，但毕竟是一种探索人类经济生活发展过程的尝试。比较精确和科学的划分是由考古学家做出的。19世纪，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提出，按照人类在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把人类的经济生活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大阶段，其中石器时代与史前时代相对应，一旦金属开始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人类就到达了文明的门槛，此后，城市、文字、阶级和国家应运而生。这一划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虽然此后在大阶段的基础上又有了更细的划分，比如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又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三大阶段的历史划分没有受到动摇，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国广为使用。

石制工具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最为简单的一种劳动工具，这一点被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在整个石器时代的两三百万年中，旧石器时代又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所谓“旧石器”，简单地说就是指未经精细打磨的打制石器。制造一件打制石器的制作工序十分简单，就是用一块砾石敲打另一块砾石，打出缺口之后，就会得到多面体、棱锥体或石片等不同形状的石器，根据不同形状可以用作砍砸器、剥削器或尖状器。这些石器可以用来刺杀、切割和剥离猎物，砸碎骨头、坚果，挖掘植物的块根，加工木器和骨器。

早期的打制石器一般都非常粗糙，在一些地方发现的石器几乎看不出它的具体用途。后来，随着生产活动的不断丰富，制作石器的技术也有了提高。其中，发现于欧洲的“舍利文化”和“阿舍

利文化”中的手斧最具代表性。“舍利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舍利而得名。这种手斧呈扁桃型或椭圆型，一端尖锐，一端厚钝，使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晚出的“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在形状上与前者基本相同，但制作更加小巧和精致，口刃更加锋利。手斧是一种多用途的“万能工具”，既可以用来挖掘植物的块根或打击猎物，也能够用作切割或刮削。在旧石器时代，除了石制工具以外，人们还使用木器、骨器和角器，只不过这些工具容易腐烂，所以很少保存到今天。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是利用这样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工具，过着一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与渔猎相比，采集现成的天然植物能够得到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最常食用的是植物果实和块根。不过，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季节和气候条件的限制，为了不断获取食物，原始人群有时候要经常进行迁移。由于妇女在采集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而在那时，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狩猎一般属于男子从事的事业，有证据表明，依靠工具的帮助，大到诸如猛犸象、野马这样的大型野兽，小到野猪、羚羊甚至鸟、鱼和昆虫，都是原始人捕猎的对象，狩猎为他们提供了肉食的来源，有助于促进体质和大脑的发展。虽然狩猎的成功与否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来源。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同时表明，旧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可能较为普遍地使用了围猎的方法获取大型动物。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用石头、木矛等工具惊吓野兽，使它们不断奔跑，直到精疲力竭，最后束手就擒。或者把成群的受到惊吓的野兽驱赶到悬崖摔死。在欧洲一些旧石器时代的崖壁遗址中发现了成百上千的大动物的遗骨，正说明了这种方法的使用。

在旧石器时代，除了石器工具之外，还有一项足以表明人类征

服自然潜能的伟大发明，那就是火的使用。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和法国的埃斯卡里山洞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人工用火的痕迹。最初引起原始人关注的肯定是天然火，可能在森林大火过后，人们发现被火熏烤过的动物味道更加香美，于是把尚未熄灭的火种带回了驻地。因此，最初被使用的无疑是天然火，人工取火在何时以及如何被掌握仍无定论。但无论如何，火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火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火不但可以用来驱赶、捕猎和防御野兽，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来加工食物，人们发现，烧制的食物不仅味道好，而且经过火烧烤之后的食物纤维更加易于咀嚼和消化，人类从此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人体的内脏、大脑、骨骼等器官的进化速度也加快了。最后，火还能够用来御寒，有了火，人们可以深入到北部的寒冷地区，人类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

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进入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的制作技术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石器的器型不仅更加多样化，而且工艺也越来越细致。人们发明了一种石器压削技术，使用骨制的压削器从石器表面压削出鳞状的薄片，从而加工出锐利的燧石矛头和石刀，此外还出现了锥子、研磨器和小刀等石制工具，这又带动了骨器和角器的进一步发展，用来缝制兽皮衣服的骨针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此外，人们开始把石器和木器结合起来制造出复合工具，比如鱼叉、投掷尖矛和标枪，弓箭也被发明出来，所有这些使狩猎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过，采集活动仍然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采集的范围、种类和数量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经济革命即将到来。

2. 初民的社会生活

如果说对于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我们还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址、遗迹和出土的遗物得到一些直观的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初民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直接材料，用这些十分有限的人类活动痕迹复原那一时期人们生活的实态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与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有限的痕迹还是可以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同时，以现存的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始材料的不足，从而能够为我们勾勒出那个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大致轮廓。

我们可以大致把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分成两个阶段，即前氏族公社（或原始人群）阶段和氏族公社阶段，后一个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前氏族公社阶段持续了上百万年，但目前对于这一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婚姻制度和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由于早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食物短缺，再加上极高的死亡率，前氏族公社的规模十分有限，一般不超过几十人。有学者根据远古人类居住地的规模和一次捕获猎物的数量，估计一个公社的人口在 30 ~ 100 人之间。部落内实行完全的公有制，采集和狩猎的收获物共同享用，平均分配，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公社作为一个集体延续和存在。简单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是存在的，部落首领的产生仍然依靠从动物群继承下来的优势原则。据推测，前氏族公社的婚姻形态可能采取一定程度上的族内群婚的形式，婚姻按辈分划分，所有的兄弟姐妹以及从兄弟姐妹之间都

互为夫妻，只是亲子之间的婚姻被禁止。

前氏族公社是如何向氏族公社过渡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避免族内婚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同时，生产的发展也要求一种更加稳固和系统的社会组织，人们把过去偶尔存在的外婚形式变为惟一的婚姻形式，两个互相通婚的氏族组成最初的部落，以外婚制为基本特征的氏族公社便产生了。氏族公社是一种更为系统和完善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源自于一个共同祖先而且内部不能通婚的血缘亲属集团，内部实行公有制，平均分配劳动所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更高一级的部落。在氏族具有自身管理机构的同时，部落也形成部落大会和氏族酋长会议等机构，氏族数量的不断增多表明人类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

最初的氏族公社成员的血缘关系是按照母方计算的，所以成为母系氏族公社。由于实行族外的群婚，所以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成为维系氏族社会的核心，受到公社成员的普遍尊重。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由于妇女在人的再生产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妇女在生产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妇女所从事的植物采集活动在当时是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女性的生育能力的崇拜，在很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普遍发现的妇女小雕像，以略带夸张的形式突出了女性生理特征，正是这一崇拜的产物。

母系氏族公社贯穿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之后开始解体让位于父系氏族公社，与石器时代妇女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对应，也正是由于男子在新出现的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农业和畜牧业占据了优势地位，才会有女权的普遍衰落。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的构筑的前提和基础。

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两性之间的平等协作、收获物的集体共有和在氏族成员中的平均分配、生产技术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在后来发生的农业起源当中功不可没（因为长期的采集活动使妇女最先掌握了某些可食用的植物的生长规律），这些都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一切导致其解体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对偶婚以及随之酝酿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作为一种母系氏族公社的破坏因素逐渐发挥作用；剩余产品的丰富使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得以萌芽；为夺取更多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为目的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日益频繁，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母系氏族公社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已经到了一场彻底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前夜。

3.“农业革命”和文明的产生

把农业的起源称为一场革命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同时也引起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创造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化，定居的生活方式、城市、文字、金属工具、高级宗教、哲学思想等等都是这场革命的产物，可以说，今天我们仍然在享用着那场革命的所有成果，仍然生活在那场革命赋予我们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造物当中。进入到工业文明之后，农业依然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部门，是其他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和基础，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很多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依然保留在我们的生活和头脑当中，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总之一句话，没有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

前面讲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石器的制造技术和生产规模上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所谓中石器时代之后，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时代。

所谓新石器，就是经过打制后再进一步加以磨光的石器。与旧石器相比，新石器不仅在器型上更加丰富多样，制作工艺上更加讲究和耐用，而且新石器的出现与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同步展开的，在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埃及以及中国发掘出的磨制石磨、石锄、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正说明了这一点。

要准确地描述农业起源的动因、时间、地点和具体过程并不十分容易。应该说，人们从食物的采集者和狩猎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和饲养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过，可以肯定，就谷物的种植而言，妇女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随着采集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某些可食用植物的生长规律，认识到它们的种子落地、发芽、生长和结果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人们想到，如果把这些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按照其生长的要求进行播种，就会得到更加丰富和稳定的收获。

对于农业起源的机制和动因，学术界众说纷纭。近来，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叫做“边缘地带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这种说法认为，农业的产生最初可能基于一次人口的增加，在靠采集不能养活数量增多的人口时，就会有一部分人迁往其他地区，但由于在新的居民点没有本地的作物，于是就萌生了把原地区的植物和动物“搬过去”的想法，带上植物的种子和猎物的幼崽在新地点进行播种和饲养。当人们惊讶地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收获物远比原来的方式更为稳定和丰盛时，这种新技术就会自然地

搬回老家，就是这样，农业产生了，并迅速地向更广大的地区传播。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考古发掘证明，谷物的培育与动物的驯化大致出现在同一个时期。最初被驯化的是一些小型的家畜，狗和绵羊是最早被人驯养的动物，后来才有了牛和马的驯养。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畜牧业看作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文明的起源一样，农业的起源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出现了三个独立起源的农业中心，它们是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

从时间上看，西亚是农业和畜牧业最早的发源地。西亚是小麦、大麦、扁豆等农作物的原产地。据考古发掘，大约在 9000 年前，伊拉克北部的耶莫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扁豆、豌豆等农作物。这一农业发源地的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西亚扎格罗斯山区、小亚细亚半岛南部、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地。

在中南美洲，约 7000 年前，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栽培出最早的玉米。另外，秘鲁人还独立栽培出马铃薯等作物。中南美洲因而成为玉米和马铃薯的故乡。

农业另外一个重要的发源地是东亚，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和泰国等地。其中，大约在 6000 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出了小米（又称为粟）；大约在 7000 年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开始种植水稻。这些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在新石器时代，包括狗、羊、猪、牛、马、鸡以及骆驼在内的动物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被驯化成功，成为后来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几种主要家畜。伊朗西部的阿里·库什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西亚地区已经开始饲养山羊和绵羊。与此同时，猪也开始在西亚和希腊地区被饲养。土

耳其的恰尼约遗址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猪的饲养地点，西亚和希腊地区也是最早驯养牛的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居民已经饲养猪、狗等家畜。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驯化了驼马和羊驼。

最原始的农业耕种方法称为“刀耕火种”。首先选取一块土地，把树木砍伐掉，然后焚烧草木，到了适当的时机，就是播种、看护与收割等农事的基本程序。继“刀耕火种”的发展阶段之后就是“耒耜农业”，这种进入成熟阶段的农作形式成为前工业社会最普遍的一种农耕方式。最早的“耒”只是一个带尖的木棒，主要用来翻掘和平整土地，由于“耒”的使用延长了人的手臂，使耕种者不必弯腰，采取直立的姿势就可以进行作业，因此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劳动效率。“耜”是“耒”的进一步改进，就是在“耒”下再附加一块平板，使这种农具的使用方式更加多样化。在“耒”和“耜”的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了锄、铲等农具。到了铁器时代，牛和犁开始用于耕地，人类的农业生产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农业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首先，在居住方式上，由于农业生产使人们有了相对固定的居住地点，于是人类告别了从前的随季节和自然条件而不断迁移、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告别了野兽出没的天然岩洞，开始了定居的生活，聚落出现了。这些最早的村落通常选在一个靠近水源的平原地区，由四周分散的耕地和中央集中的居住区组成。为防御外敌和野兽的侵害，居住区的周边会挖出一圈壕沟，圈内就是大大小小的房舍，早期的房舍通常是半地穴式，在炎热潮湿的地区也有干栏式建筑，建筑材料主要是草泥和木料。在居民区的中央会有一个较大的房舍，是氏族首领的居所，也用来召开氏族会议。制作日常生活用具的陶窑和埋葬死去氏族成员的公共墓地也是聚落必须具

备的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考古发掘的氏族公社遗址了解到，虽然存在不同的地方特色，但聚落大体上是由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这些聚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的农业生活的实态。

与从前的采集和狩猎经济相比，农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的产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使粮食可以储存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冬天缺粮的问题，家畜也可以在天寒地冻的时节继续享用，这样就基本解决了采集狩猎经济所无能为力的不能应对季节变换和自然灾变的难题，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了。

其次，农业带动了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领域的萌生和发展。在最初发展起来的那些古老的科学学科中，例如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等等，几乎都与农业生产的需要息息相关。还有许多的发明创造，如制陶、纺织、轮车等，无一不是农业经济的产物，有人说，发明于农耕时代的轮车拉开了以机械征服世界的序幕。此外，农业产生后，也有了更多的保留记忆和相互交流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类文化的内容和容量从此极大地丰富了。有趣的是，英文中的“文化”一词 culture 来自于拉丁文 cultura，本义就是“耕种”的意思，后来泛指一切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创造物。

最后，农业的产生导致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农业使人类第一次能够生产出足以维持并超出自身需要的农畜产品，这引起了人口的增长，同时，剩余产品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生产去从事其他的管理和文化创造活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公有制日趋解体，私有制逐渐萌生，社会内部出现了贫富的分化和等级的差别，从前的氏族机构和氏族首领的权力不断增长，正向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和国王的方向发

展，于是国家产生了。

一言以蔽之，文明起源无一例外地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在世界历史上绝没有不经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就建立起国家从而进入文明社会的特例。当然，国家的起源和文明的产生也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至少有四个独立起源的文明中心，就像四颗明星首先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夜空中，按照文明产生的前后顺序，它们是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即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这些最初的文明无一例外地产生在大河流域，产生在或靠近最早的农业发源地，由此可见农业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 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生活

1.“轴心时代”与经济伦理问题的探讨

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知道使用金属。在土耳其的恰尼约遗址中，发现了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钻孔珠、别针等物品，年代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铜器。人类最早学会冶炼红铜，但由于其质地较软，不能在生产中应用。真正的青铜时代开始于青铜的冶炼和较为广泛的应用。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与红铜相比，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较高和易于锻造的优点，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青铜被制造成各种劳动工具、器皿和武器，大约在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商周时代的中国都经历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应该说，在那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一个缓慢的发展阶段。

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一种新的金属开始在欧亚大陆传播开来，那就是铁。与青铜相比，铁的造价更加低廉，坚硬程度更大，一出现就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因此，铁器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又一次巨大的飞跃。更值得注意的是，铁器的使用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全面发展，进而引发了一次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大转型，在那次生产力的飞跃当中，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几乎同时迎来了人类精神觉醒的曙光，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德国哲学家把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这次人类经济发展和文化创

造活动的飞跃时期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下面我们就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和希腊为例,来看一看人类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由此引发了哪些新的社会问题,以及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应对的。

首先,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和希腊都处在一个古代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通过种种文献和考古材料,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与前一个历史阶段相比,中国和希腊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实际上,这些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是某种“连锁反应”,是一次生产力的整体性提高。简单地说,就是新的生产技术(主要是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又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最后,农工商业又带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涌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我们看到,这些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尤其是更多的剩余产品为一些人脱离生产活动专门从事管理和文化活动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和希腊历史上第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前的经济生活模式和平衡状态被打破,种种社会问题应运而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改造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

在世界范围内,应该说,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并不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西亚、北非、印度、欧洲中南部地区就先后进入铁器时代,但是在这些地区,冶铁术却长期停留在块炼铁阶段,一直到14世纪才懂得冶制铸铁,而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就进入到冶制铸铁阶段,有学者认为,中国冶铁技术的快速发

展很可能得益于西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同时，铁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也十分迅速，与周代的青铜冶铸业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不同，冶铁术出现以后，很快就由早期的以武器为主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铁制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扩展。

中国在何时进入铁器时代，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冶铁术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晚期，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至少在春秋晚期，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人工冶铁技术。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以前，有关铁的记载是十分有限的，且存在争议。但是，考古发掘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证明。20 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多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铁制品，通过这些铁制品，我们还是能够复原出铁器在中国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时间上看，至少在春秋的早期，人工冶铁就已出现，从出土情况看，春秋早期、中期、晚期皆有，总数在 80 件以上；从铁制品的种类来看，春秋早期以武器为主，到了中晚期，品种大增，尤其是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地域分布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出土了多件处于春秋时期的铁制农具，遍布于北方的周、秦、燕和南方的楚、吴、越等地区，分布已经相当广泛。

到了战国时代，一方面，文献中关于铁制工具的记载大为增多，例如，《孟子》中十分明确地讲到“以铁耕乎”；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铁器不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分布区域上比春秋时代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文献和考古资料再次相互印证，说明当时铁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已经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应用。据统计，战国铁器的发现已经遍及三晋、燕、楚、齐、秦以及中山、鲁、巴、蜀等地，其中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具，尤

以生产工具为多。

铁器的制造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大面积的农业开垦成为可能，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又带动了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内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都可以在铁的使用上追溯到其原动力。与此同时，在春秋以前，作为后世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畜力的牛主要用于祭祀或食用，春秋以后，牛开始用于耕田，这一全新的生产力因素与铁器相互结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发展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把春秋到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作成一个函数曲线图的话，两条曲线的形状应该是基本一致的。有学者注意到，在反映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史料《左传》中，直接涉及财货之事的仅有80余条，只偶尔提到金，钱币更是无一语及之，《论语》中也是如此。战国时代的文献中这种情形则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关商品货币关系和钱币使用的记载大为丰富，在这一点上，《战国策》、《孟子》等书与《左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富商大贾频频出现，市场交换日渐繁荣，甚至战国时代的小农都与市场发生了较为普遍的联系，《孟子·滕文公上》曰："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正是这一变化的写照。

中国的商品交换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大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有制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最初的动产私有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也日益成为私有财产，同时，特别是一些无形的"资产"也开始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这一切说明商品交换经济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商品交换意识开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春秋以前的社会所不曾出现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这方面的记载越来越多，比如土地的买卖，说明了不动产的商品化；奴隶的买卖，雇用劳动的出现，娼妓制盛行，说明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私学的兴起，医药、卜筮行业的出现，说明了知识的商品化。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甚至还体现在政治领域，那就是买卖官爵的现象。总之，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商品交换活动基本上还局限在远距离的各地土特产和奢侈品上，受益的对象还局限在少数贵族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商品交换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参与交换的主体也由贵族和富有阶级向中下层社会扩展，就连普通平民也都逐步卷入到各种交换关系当中。

第二，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富商巨贾的出现。有学者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文明早期工商业活动大多是由外来民或奴隶进行的，因此工商业者的地位十分低下，工商业活动也被视为贱业。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到，不论是两河流域还是早期的希腊罗马，都存在这种现象，中国古代亦不例外，这与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者一直占据特权阶级主体的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尤其是工商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在《左传·昭公十年》中记载，人有十等，但是没有提到工商，原因是他们既不为人所臣，亦不臣他人，在宗法制度社会中是一个不入流的阶层。可以推测，那时候，依附于官府的工商业者大多是奴隶，或等同于奴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到了春秋以后，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私人工商业者的日益增多，一些本地的氏族公社成员，甚至一些破落的低级贵族，开始加入工商业者的行列，上述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进入了

“四民”(即士农工商)的行列。与此同时,财富的集中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有名有姓、财富可观的私人工商业者,司马迁专门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记下了他们的活动和成就。他们不仅通过经商致富,而且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郑商玄高、蜀商吕不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富比王侯,地位极高,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实不为过。这样,在从前依靠血统获取政治权利的“贵贵”之外,又加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即“贵富”,与另一种新的因素,即依靠学识而参与政治权力的“贵贤”相互结合,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总之,在中国历史上私人工商业者第一次打破“工商食官”的束缚脱颖而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三,市场的繁荣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在这一时代的《考工记》中,市场第一次被当作城市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要素之一被列入城市规划当中,在战国时代,甚至还出现了以市场为城市中心的建设思想,比如《市法》中讲:“市必居邑之中。”这体现了市场地位的提高,是对春秋战国以前的城市建设政治中心观念的第一次冲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私营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和军事性质,工商业的经营活动仍然要在封建统治者划定的范围和限制内进行,私营工商业活动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和政策的变换时松时紧,上下沉浮,私人工商业者从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末期才有所改变。

下面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同时期的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希腊的古风和古典时期(公元前 8 世纪—公元前 4 世纪)是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公元前 8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大体相

当的一个时代，这种对应性不仅仅是在时段上接近，更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上也存在诸多相似性。

首先，与爱琴文明时代相比，荷马时代经历了一次经济的全面衰退，文字被遗忘，金银货币不再流通，工商业活动几乎绝迹。从古风时代开始，希腊的农业生产开始复苏，与中国的情形类似的是，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也在社会生产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虽然早在荷马时代，希腊就进入了铁器时代，但真正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还是在之后的古风和古典时代。在古风时代惟一反映普通农民生活的诗歌作品——彼奥提亚的小农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又译《田功农时》）中，可以看到对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的总结。梭伦时期，根据年均粮食产量重新划分雅典的社会等级，其中占雅典公民人口相当大比例、土地占有处于中等水平的第三等级被称为双牛级，可见使用牛耕的普遍程度。

古风时代希腊境内发生的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殖民城邦如雨后春笋般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十分广阔的区域内出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城邦制度逐步形成。种种情况表明，这场旷日持久、波及面极广的殖民运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方面的动力。一方面，这一时期希腊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另一方面，有限的可耕地不能够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强迫殖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农业生产不足为动因的殖民活动为希腊的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入古风时代以后，荷马时代中断的海外交通和商路不但开始一一恢复，而且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为古典时代的商业繁荣做好了准备。

另外，我们看到，由于希腊境内多山、多石、多岛屿的地理环

境，使得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严峻挑战，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如葡萄和橄榄）、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是补充粮食生长不足的一条重要出路，这是希腊文明不同于古代的东方文明，呈现出较大的工商业成分的根本原因，也是希腊农业经济发展的特色。我们看到，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就劝诫农人要利用农闲时节经常出海，用自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到盛产粮食的地区去换点粮食。在梭伦改革中，我们看到梭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公民从事手工业生产，鼓励商业活动，实际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雅典山地纵横，可耕地十分有限，从很早就开始进口粮食，因此，提倡和鼓励公民从事工商业活动历来是立法者增加公民收入、稳定公民团体的措施。

古风时代有关希腊经济状况的记载十分有限，到了古典时代，记述丰富起来，通过那一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戏剧家、哲学家的作品，我们看到，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相似，希腊的农工商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材料最集中的雅典为例，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人们已经掌握了施肥、培土等技术，并且对土壤、植被等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人们相信，只要悉心按照农作的要求照顾好土地和庄稼，就可以取得丰产。雅典的市场在这一时期异常繁荣。雅典人的日常商品交换活动在“阿哥拉”（Agora）上进行，“阿哥拉”最初的意思是“公民大会”，后来进而指公民开会的地点，由于公民集会之日就是贸易兴隆之时，所以从事政治活动的地点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市场。考古发掘表明，雅典的市场所在地在古风时代还是一片埋葬死人的墓地，只是到了古典时代才逐渐发展成为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

对雅典市场最直观和最生动的记载要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了。作为一个从乡村迁居到雅典城里的“农村人”，阿里斯托芬

对代表了城市特征的既热闹非凡又乌烟瘴气的市场作了夸张有趣和充满讽刺意味的描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以雅典的市场为场景，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的特产，还有其他城邦甚至希腊境外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和罕见商品。在那里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人和事，堪称雅典社会生活的多棱镜和万花筒。在比雷埃佛斯和雅典的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的货币兑换商，他们被称为“坐在桌边的人”，他们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本邦和外邦钱币的兑换业务，同时也兼营高利贷，有人称他们为历史上最早的银行家。进入到古典时代，雅典在原有的大面额货币的基础上，出现了小面额的铜币，这为小商品的交换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雅典商品经济的发达。这些说明，普通公民的市场参与度和对市场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加。

总之，不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还是古风到古典时代的希腊，都经历了一个农工商业加速发展并空前繁荣的过程，尤其是工商业活动比前一个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之于西周，古风和古典时代之于荷马时代）有了突破性进展。

毫无疑问，人身束缚的放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努力和奋斗向上层攀升，因而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发挥，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各种欲求也被调动起来。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进步都要付出代价，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人们发现，在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自由和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然地失去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作为生活准则的古老的伦理依托开始变得荒谬和可笑，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被打破，种种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惟利是图，贫富分化，人情冷漠，经济利益的追求与伦理道德的

原则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处于一种紧张冲突状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么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彻底的改造，要么根据现实的需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德标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经商的浪潮，这在战国时代更是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人身束缚的减弱和利益的驱动是这次浪潮形成的两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人们发现，务农远没有从事工商业获利丰厚，于是弃本逐末之风大盛。这种风气盛行的严重后果就是贫富的迅速分化，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道德水平普遍下降，有些人为了谋求私利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盗”成为最普遍的犯罪，“贼”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更令人不安的是，商品的交换意识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贵族官吏，下至普通小农，都拜倒在金钱——这个新的教主的脚下，成为其虔诚的信徒，“直率赤裸的逐利精神和冷冰冰的市场交换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什么都可以买卖，包括官爵和良心。

面对道德与利益的紧张，思想家们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救世的良方。道家提出回到那个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时代，从而使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儒家则在接受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主张用“礼”和“义”来制约和规定社会利益的获取和分配，向那些见利忘义者发出了“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道德呼声。法家则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消灭，成为“重本抑末”思想最为彻底的阐发者，而且这种重农抑商思想也发展成为现实的国策，一次又一次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似，希腊的古风到古典时代的哲学

思想也出现了一个由研究自然向研究人与社会的转向。最早的一批希腊哲学家以研究自然世界为主，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哲学研究的重心也发生了一场革命，从智者开始，尤其是到了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思考的对象从天上转移到了地上和人间。我们注意到，这一思想上的转变与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社会经济的繁荣基本上是同步的。市场的兴盛，奴隶贸易的发展，收费教育的出现，服务业的发达，所有这些说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已经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曾经恪守的那些古老的道德观念和习俗，人性的贪婪、自私以种种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为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探索和制定出一套新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成为了当务之急。正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成为此后的哲学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苏格拉底是完成哲学向人事转向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死标志着一种新哲学的诞生，成为那个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冲突时代的殉难者。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进行探索，伦理、道德、法律、习俗和教化是他们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他们对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农工商业活动给予了充分地关注，如何公正、合理地对待和分配社会利益是他们的政治和伦理思想的中心环节。

如果说哲学家更善于在头脑中构筑理想社会的蓝图的话，那么文学家和艺术家则更倾向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直接的揭露和鞭挞。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对新兴的城市生活既充满了新鲜与好奇，也不乏深刻而沉重的思考，在他传世的11部喜剧作品中，见利忘义、少廉寡耻的市井小人是最多的一类被讽刺和挖苦的对象。普通的农

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经常出现在他的戏剧舞台上，虽然以农民为代表的“乡巴佬”形象的愚钝、保守和无知也经常被用来制造笑料，但这种讽刺往往是温和的和善意的，他们是一种正在逝去的旧道德的化身，阿里斯托芬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乡村生活及其朴实无华思想观念的热爱和留恋，同时，对城里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的欺诈、狡猾、贪婪和自私的鞭挞却是辛辣和无情的。阿里斯托芬以戏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农工商业的深刻思考，同时，以一种更为形象和真实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的思潮，那就是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一种强烈的对抗。

2. 中国封建经济的繁荣

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飞跃和社会转型之后，中国在接下来的秦汉时代迎来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从此，中国古代的经济进入了更加平稳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地区之间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在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但是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每次分裂之后都会迎来更大规模的统一和经济繁荣。与同时代欧洲的蛮族入侵之后造成的经济的大幅衰退、文化断裂、政治长期分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但完成并保持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不断走向辉煌，成为惟一一个存活下来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古代文明。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奠基、隋唐时期的繁荣、宋元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中国的封建经济在持续时间、发展规模和发达程度上保持和创造出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繁荣局面。

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统一，但由于暴政，很快就被汉朝取代。汉朝包括了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9 年）和东汉（25 年—220 年）两个阶段，在长达 400 多年的历史中，汉朝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的盛世局面，以其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力与同时期欧亚大陆西端的罗马帝国遥遥相对，并称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

在农业生产上，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发展之后，铁制农具和牛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推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京城长安和三辅地区教百姓使用二牛三人的“耦耕法”耕田；同时，中央的大司农专门设置了铸铁之官，在全国 44 个郡县遍置铁管，“作铸铁器，给用甚众”。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灌溉，汉代先后开凿了漕渠、六辅渠和白渠等著名的水利工程，并几次大规模治理黄河，消除了从前经常发生的水患，此后黄河在 800 年中都没有改道。在推广“耦耕”的基础上，赵过还发明了“代田法”，就是把一亩土地分成三条圳，宽一尺，圳上是垄，也宽一尺，用垄边的杂草和沃土来给圳里的禾苗壮肥，而同一块土地上的圳和垄年年调换，以此方法来恢复地力。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使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到汉成帝时，氾胜之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区田法”，就是把土地划分成很多小块，挖成沟坎进行灌溉和施肥，这样一些干旱的山陵和高坡也得到了利用。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提高最明显反映在人口的增加上，两汉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 5000 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此后的 1000 多年中，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这个水平上徘徊。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经济的繁荣，对此，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作过大量生动的记述。他这样描述当时人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当时的货物贸易十分发达，据《货殖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全国可以划分为四个经济区：西部，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一带，出产竹、旄和玉石等；东部，包括河北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出产鱼、盐、漆和丝；长江以南地区，出产姜、桂、金、锡、丹砂、象牙等；北部，包括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出产马、牛、羊、筋、角等。汉代发展出一批包括洛阳、临淄、邯郸、宛等城市在内的著名商业和贸易大都会，其中，西汉的都城长安独占鳌头，是西北、巴蜀和内地贸易的枢纽，其规模宏大，方圆 60 里，设有 12 道城门，是当时西方罗马城的 4 倍。长安城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由于规模庞大，商品众多，政府专门设官管理。由于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汉代对一些手工业品实行官营，其中最大的部门是制盐、冶铁和铸钱业。此外，还有很多手工业部门官营和民营同时存在，如纺织、漆器、舟车制造、木器、竹器、武器等。

汉代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公元前 138 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同中亚、西亚的关系，开创了由中国长安通往西亚、中亚再到大秦（即罗马帝国）的著名"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远销到西方，芝麻、核桃、蚕豆、胡萝卜、葡萄等作物也从中亚一带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

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帝国的崩溃使封建割据和混战取代了统一和集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全面的衰退，与汉代相比，城市经济衰落，货币经济萎缩。由于不堪忍受战乱、饥荒和压迫，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离开故土，北方的人口大

量南迁。虽然社会动荡、经济衰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表征，但这种倒退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民族的大融合，佛教的迅速传播，儒、释、道的合流，令魏晋的文化呈现出博采众长、异彩纷呈的局面，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北人的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充裕的人力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从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也为隋唐时期的下一个盛世局面做好了准备。此外，在魏晋时期，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加深的趋势，封建国家在土地和赋税制度上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加强了，出现了占田制、户调制、屯田制、均田制等新的土地制度，在经济制度上更加细致和完善，这些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时期一两百年南北对峙的局面，国家又一次归于更大规模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隋唐时期，土地的垦殖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造田运动”把江南地区和岭南地区的大量荒地变为良田，可以说，到了唐代，全国从南到北的平原地区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平原，山地和河湖地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唐代的“围田”和“圩田”就是一种化湖为田的做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从前的决湖为田，不必把水排干，而是建造围堤或圩岸，把堤岸伸入水中，从水中造田。这种方法在种植水稻的地区尤为适用，江南地区在隋唐以后成为中国的粮仓就得益于这场运动。在宋元时期，这样的造田运动得到了继续发展，又发明出“架田”、“柜田”、“沙田”、“梯田”等方法，因地制宜地开发新的水土资源，耕地面积的扩大是隋唐宋元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农业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多十分重视水利灌溉，隋朝曾经

开凿大运河，这对南北交通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功不可没，唐代后期在江南地区也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兴修水利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宋朝朝廷采取民间和官府合作的形式，在兴建新的水利设施的同时，全面修复和疏浚了旧有的河渠，使全国的河湖成为一个网络，为扩大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服务。在宋元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与前代相比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犁耕的种类丰富了，还发明出筒车、水轮等灌溉工具，元代王祯的《农书》是继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占据了书中 4/5 篇幅的《农器图谱》，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农具，包括耕地的犁耙、播种用的耧车、收麦用的推镰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作物品种的极大丰富上。一年两熟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传入福建，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的种植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由此才有了后来“苏湖熟，天下足”的名谚。此外，茶叶、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在隋唐到宋元时期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种植。

官营和民营手工业并存是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其中，官营手工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基本垄断了包括冶铁、制盐、采矿等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手工业部门。不过，官营手工业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就是技术先进、设备优良，实力雄厚，加上经验的长期积累，在手工业技术和成就上十分突出，流传下来大量的巧夺天工之作几乎都出于官营手工业，这些工艺品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现在为全世界的人们瞩目和喜爱。但是，随着手工业自身的发展，其内部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官营手工业内部，到唐代以后，从前大多使用奴隶或官户（即隶属于官府的人户）劳动的状况在悄然发生变化，官府募雇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宋代甚至成为官营手工作坊的主体，这种由征役

劳动向雇佣劳动的转变代表了一种生产关系上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民营手工业者的独立性逐渐加强，同时，官营手工业不能包揽所有产品和人力资源的弱点也越发明显。曾经在古代辉煌一时的官营手工业日益呈现出衰微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在规模、数量和产量上不断壮大起来。

从隋唐到宋元时期，发展较快的手工业部门包括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陶瓷制造业、造船业和印刷业。唐代的“三彩”陶器、宋代的景德镇瓷器、唐代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在隋唐时代，从前旧有的商业中心东西二京（即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继续保持了它们的繁荣，以其人口的稠密、商业的发达、宏伟的气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都市。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以南也涌现出很多著名的商业中心，其中，扬州、成都、杭州、广州都是商旅云集、店铺林立，表现出明显的地方优势和更大的发展潜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呈现出近代化趋势的地区。在宋代，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是唐宋经济的一个亮点。隋唐时期，对外的商路分为陆路和海路两个部分。在陆路方面，以长安为中心，经河西走廊，过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可到达西域和中亚各国。另外，还有三条路线可以到达印度：一是经葱岭南行经阿富汗至印度；二是由四川入西藏经尼泊尔到印度；三是经云南出缅甸到印度。在东北方向，从夏州（今陕西大里河北）经大同达大漠南北；出幽州（即北京以及河北武清等地）经辽西，渡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在海路方面，广州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广州可以越马来半岛到苏门达腊或爪哇，再由此到达锡兰（即今天的

斯里兰卡),或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从广州出发,还可以经马来半岛、锡兰入波斯湾;或沿阿拉伯海岸到达红海。此外,还开辟了几条到达朝鲜或日本的航线,其中一条从山东登州和莱州经辽东半岛可以到达朝鲜和日本,另外一条是从扬州或宁波出航到日本。到了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远洋贸易的发展。唐王朝特设"市舶使",负责海上贸易。

总之,唐宋时期中外商品的交流不论在规模、种类还是国家数量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纸等商品大量远销国外的同时,海外的马匹、香料、药材、珠宝、象牙等也批量输入,中国与亚欧各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中亚进而传播到欧洲的,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对后来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时期。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内因,即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外因为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大国的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推行殖民政策,用武力进行奴役和掠夺,造成明清以来封建经济日渐衰落。

元朝灭亡后,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安定社会秩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农业上,大力推行重农务本政策,提倡开垦荒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同时,在赋役制度上进行改革。1567 到 1572 年,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所有各种赋役合并起来,实行计亩征银。"一条鞭法"的实行统一了赋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虽然明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抑商”和“海禁”政策，但是明代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还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在手工业人数、生产技术和手工工场规模上都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各种商业行会组织，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私人的海上贸易和边疆贸易，其产品的种类、规模，还有交易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发生在1405到1433年之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这是中国古代航运和外贸史上的一大创举，开辟了亚非国家海上交通的新航线，推动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但与稍后发生在西欧的航海探险活动和新大陆的发现相比，宣扬明朝封建宗主国地位的政治目的和朝贡贸易的经济本性又使这次远洋航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

	郑和下西洋	哥伦布航海
首航时间	1405年	1492年
次数	7	4
船只数量	200多艘	3~17艘
船只大小	大宝船长125.65米，宽50.9米	长24.5米，宽6米
随行人员	27800人左右	1000多人
航海目的	偏重于政治和外交	偏重于经济目的
结果和影响	虽然国威远扬，但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走向衰弱	世界走向一体化，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清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应该说，清王朝前期的社会经济还是保持了稳定和发展，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

世纪初，才出现内外交困的全面危机。

清朝建立之初，曾大规模推行圈地，造成了清初农业生产的萎缩。到顺治时期，广泛进行军屯和民屯，并大力鼓励垦荒，推行招民劝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也得到了保证。康熙统治时期，对前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废除了圈地令，实行“更名田”（对前期藩王留下的大批土地，包括已经被农民占有的部分采取“荒熟田地、酌量变价”出卖的方法加以处理），完善垦荒政策，这些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康熙在开发边疆的问题上也表现出雄才大略。新疆的大规模开发、台湾的统一，都是始于康熙时期。在他统治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有了惊人的增加。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开始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即位（1723 年）后，开始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固定的丁税摊入当地的田亩，表现出中国封建时代晚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的趋势。“摊丁入亩”的实行既保证了田赋收入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阶级矛盾。

在工商业的发展上，康熙时期比较开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以此为基础，到雍乾时期，丝织业、制陶业、采矿业、盐业、制糖、造纸等行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四处设置海关，直属户部，作为外国来华商人的通商口岸，同时，对于国内商人的出海贸易，也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和规范手续，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在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商业活动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鼎盛状态。在一些大中城市，在恢复旧有的商业区的基础上又不断形成新的商业区。乾隆年间，北京的前门一带，游人之多，交易之兴盛，几至“对面交言听不真”。在华

南，以陶瓷著名的佛山镇，共有大街小巷622条，人口数十万，多半为工商业者。与康熙时期相比，雍乾时期的对外贸易额和关税收入都有增长，出口的产品包括生丝、丝织品、瓷器和茶叶，其中，茶叶的输出量增长最快，因此，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始终保持着出超的有利地位。

表二：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京城面积之比较

城市	年代	城墙环绕的面积（平方英里）
长安	公元前1世纪	4.00
罗马	2世纪	0.90
北京	13世纪	18.00
伦敦	13世纪	0.51
北京	16世纪	24.25
君士坦丁堡	15世纪	9.00

盛世蕴藏着危机。康雍乾之后，到了嘉道时期，吏治腐败，贫富分化加剧，土地兼并和集中，种种社会问题显现出来。农村经济日渐凋敝，手工业萎缩，加之鸦片的输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但封建统治者仍然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虚幻和自满中，不知道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清王朝正面临全面的危机，中国社会已经到达了列强压境、一步步陷入民族危亡深渊的前夜。

3. 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异同

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表现出一

种从共性占据主导地位到个性逐渐得到彰显的过程。

在文明产生之前，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普遍经历了石器时代，在那时，虽然存在着一些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但采集和狩猎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两种主要的谋生手段，人们使用的工具不外乎石器、骨器和木器，其形状亦大同小异，这一点从世界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上可以得到证明。不仅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上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男女两性的自然分工，女性在生产和生活中较高的威望和地位，以母亲的血缘来判定氏族成员的身分等等，都说明了人类史前文明的趋同性。

接着，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生之后，最初的文明又毫无例外地在大河流域的农业发源地产生了，作为文明产生的标志，文字、城市、阶级、国家先后出现在那些地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文明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乃至分野也开始悄然发生，文明就像一条河流，在发源地就是一条涓涓细流，随着水量的增长，开始随着地势的起伏和变化一次又一次出现分叉，但是，尽管分野和差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万变不离其宗，人类的各个文明之间还是存在着共同的起源和发展道路的统一性，追求着相同的目标，文明之间不断地碰撞、交流和融合正是这一共通性最直接的体现。因此，文明发展道路之间的同与异总是相对的，同中有异，异中存同，正是在同与异的互动中，人类社会不断共同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当代世界各地的差异性要大于近代，近代的差异性大于古代，古代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又大于史前时代。如果我们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历史以公元 1500 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从文明产生之初到 1500 年以前都可以称为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1500 年以后开始进入到近代社

会或工业社会。如果说从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转型直到今天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的话，那么近代的所有古代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文明，这是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最大的共性，但是这并不排斥非农业经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地区呈现出的较大差异和自身的特色。下面我们以古代中国和希腊为例，看一看东西方的古代经济有哪些异同。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明，即“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前者以海洋为特色，工商业发达，崇尚民主和自由；后者以大陆为特色，以农为本，注定产生专制和奴役。前者以古代希腊为代表，后者则以古代中国为代表。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如果我们深入到这两种古代文明的内部，从历史记载和典籍中看看当时的希腊人和中国人生活的实态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首先，不论在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农业都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是立国之本。中国古代的文明发祥于黄河和长江流域，肥沃的冲击平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生产当作头等大事，农业收成的好坏成为王朝治乱的晴雨表，包括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都可以在以农立国的经济生活中找到其源头。农业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自不待言。

再看古代希腊。的确，与古代中国文明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相比，古代希腊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特色，希腊被海洋所包围，基本上由半岛和岛屿所组成，而且境内多山多石，只有几条小河和数量有限的小平原点缀其间。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古希腊的农业一开始就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就是在种植谷物的同

时因地制宜地大量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因为葡萄和橄榄扎根很深，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在很多不能种粮的山地也能生长，再加上希腊冬暖多雨、夏热干燥的地中海式气候，就更加适合这种农业生产的模式。于是，制造葡萄酒和橄榄油就成为希腊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进行的一种副业，到了农闲季节，人们经常把自家生长的葡萄和橄榄到运到海外的产粮地区出卖，以此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由于希腊三面临海，岛屿密布，岛与岛之间相隔不远，一年中多以晴天为主，能见度好，而陆上多山，因此，海上的交通相对便利，这又为希腊人发展航海和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些因素使古希腊的农业生产表现出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似乎符合所谓“工商业文明”的标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工商业的产生与其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营利润和生产资本，不如说仅仅是农业生产的一种有益的和重要的补充，是农本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句话，是为了谋生，而非营利。

在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占据城邦主体的一直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公民，只有公民才能占有土地是一条普遍的法则，虽然公民中独立的工商业者在城邦后期在人数和影响上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并不能改变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在经济性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农业生产的特点上存在不同和偏向。另外，如果说古希腊的某些城邦在某些时期发展过较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在规模和水平上与希腊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为先进。不过，与希腊以私人工商业为主不同，中国古代的官营工商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与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的不同使然。总之，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经济从总体上看都是一种农本经济，但并不排斥作为农本经济的补充工商业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如果

其发展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对这个根本造成破坏，因此，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小农经济是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执政者治国安邦的共同任务。

这种大体上一致的经济属性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都有一种重农轻工商的观念和意识。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本末观”，指的就是这种观念。“本”泛指农业，“末”泛指工商业，从春秋战国时代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念产生以后，“重农抑商”的思想就成为历代封建经济思想的正统，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这种思想观念并不为古代中国所独有，而是一种在前近代所有的传统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的普遍存在也反过来说明了农业是所有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例如，在古代希腊，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农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中也透露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念，在理论上与中国古代的“本末”思想别无二致。色诺芬认为农业是其他一切技艺之母，农业繁荣，其他行业也会兴盛，农业萎缩，其他行业也会随之衰落。同时，色诺芬也看到了工商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农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农工商业作出了全面和系统的思考，他们认为，农业是一种自然的和高贵的职业，不仅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对城邦的治理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公民安心于农业生产是立法者的头等大事。与农业相比，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虽然也是人们经济生活之必需，但有损于人的身心，而且违背自然，所以应该越少越好，而且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出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古代希腊人的“本末”观念比较偏重于经济上的分析和伦理上的评价，没有对城邦现实的经济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古代中国的“本末观”则更偏向于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现实需要，不

断得到系统和完善，被统治者所接纳，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

三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

1.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

公元1500年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以农业或畜牧业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部门，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从总体上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大，人们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是这种均衡状态在1500年前后开始被打破，因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西欧酝酿和形成，并很快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和蔓延，一场经济生活的革命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正在悄然发生，这是继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改变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革命，应该说，我们今天仍然还处在这次革命的过程当中，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因、机制和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作出一些粗线条的勾勒和画龙点睛式的述评。

首先，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产生虽然是传统和近代社会的分水岭，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确实脱胎于传统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早在封建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西欧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这种萌芽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分散的手工工场的出现。

以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为例，当时毛纺织的从业者达到了3万多人，占全市人口的1/3，手工工场达到200多个。从14世纪上半叶起，佛罗伦萨开始直接从英国大量进口优质的羊毛。大规模制造优质呢绒的需要促使毛纺织业行会的商人发展起一种十分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工业组织。整个生产程序被分为20道工序，包括梳毛、纺纱、织布、漂洗、上色、拉幅等，每道工序都由数家手工作坊承担，整个行业控制在毛纺织和布匹加工两个大的行会手中。中世纪行会的作用不是为了提高产量和增加销路，而是为了维持垄断，所以不鼓励技术革新，这后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作坊中，主要有匠师、学徒和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两极的分化，成为后来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前身。像佛罗伦萨这样的手工工场，在意大利很多其他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也纷纷出现。实际上，在意大利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地中海是中世纪欧洲经济和贸易生活的中心地区，而意大利正好就位于这一区域的中心位置，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意大利商人容易在东西方的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积聚起大量的财富，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从而发展起一系列新的经营手段和技术。但是，这些在意大利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能够开花结果，因为对商业的过分重视使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具有牢固的根基，更主要的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些早期的商业中心的衰落成为必然。

继意大利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后起的荷兰、英国等地茁壮成长起来。这些国家顺利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所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原始积累”，就是资本主义产生所必备的两个要素的准备，一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并成为能

够购置设备、雇佣工人的资本，拥有这些资本的人也就成为资本家；二是多数人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无产者。在西欧，这两个要素的准备过程是依靠暴力实现的，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英国的“圈地运动”最早开始于15世纪的后半叶，16世纪出现高潮，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所谓“圈地”，就是用暴力的手段剥夺个体农民的份地。这场运动最初是开端于毛纺织业的发展对羊毛需求的急剧增长，由于养羊的受益远远超过农业，所以新兴的贵族就利用暴力、退佃等办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然后用栅栏把大片土地圈占起来做牧场。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的农民被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成批地沦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这场运动被称为“羊吃人”的运动。“圈地运动”强制消灭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制度，开始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成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成为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资本原始积累在西欧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殖民掠夺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种，通过从亚洲、非洲和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和金钱“源源流入宗主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这就要讲到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欧人的远洋探险活动和新航路的开辟。

新航路的开辟是以下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西欧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尤其是新兴的商人和资产阶级对货币财富的普遍需求和渴望；欧洲人对亚洲财富的向往，比如，当时风靡欧洲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印度、中国、南洋和日本的富足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这些遍地黄金的描述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上层社会到东方寻金

的热情，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探寻通往东方的航路；15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控制了东西方的传统商路，对往来于地中海的欧洲商人横征暴敛，百般刁难。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西欧的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地想绕过地中海东部另外开辟一条新航路直接通往印度和中国。同时，造船技术的改进、罗盘针传入欧洲以及地圆学说普遍为人们接受等因素也为新航路的开辟创造了外部条件。

这样，从 15 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先展开了一场海外探险和远洋航行的“竞赛”，其中三次最著名的航行是：1492—1502 年，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1497—1498 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到达印度；1519—1522 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船队作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划分势力范围，开始了疯狂和血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数量巨大的黄金、香料和奴隶源源不断地运入这两个国家。但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十分牢固，殖民掠夺的财富大多用作宫廷的奢侈生活、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或在对外战争中消耗，没有能够在本国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本国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国内工业反而衰落了，因而造成了这两个国家殖民优势的丧失。继西、葡之后大规模从事殖民活动的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由于这些国家的国内雇佣关系发展充分，工业发达，所以资本积累的效益十分显著，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国力日渐强大，其中，英国在 16 世纪异军突起，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得力于毛纺织业。最初从农村中发

展起来，后来向城市拓展，但农村一直是毛纺织业的主要根据地。通常是手工作坊主雇人进行生产，由商人收购并向市场销售，由于乡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水力驱动的漂洗机的出现，使得英国的毛纺织品成本较低，价格便宜，在本国和国外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与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出现的普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也比较清明，尤其重要的是，政府采取了种种降低税收和保护关税等措施以扶持本国工业。16 世纪，欧洲大陆的许多熟练工人由于宗教或政治迫害等原因纷纷移居到英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技术，还促进了造纸、玻璃制造、钟表等行业在英国的创立和发展。这些为以毛纺织业为龙头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在英国的新兴工业中，最重要的是采煤和冶铁业。中世纪的主要能源木材在这时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因此，煤矿开采业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工业发展所必须的重要能源。英国的冶铁业最初是在铸造大炮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后来也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英国之所以能够在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后来居上，异军突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封建土地关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比较彻底。15 世纪末，经历了“红白玫瑰战争”，英国的旧贵族自相残杀，消失殆尽，新贵族受到时代的影响，观念转变较快，尤其是羊毛的大量需求和丰厚的货币收益使得封建主迅速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方式，把圈占来的土地大量合并，出租给农民或雇人来养羊，按照市场条件的变化收取新式的地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封建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转变，封建的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取代。首先在农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为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在其起源过程中，最初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后来开始向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拓展。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正是这一新兴的经济制度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最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逐渐成熟和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从旧有的封建王朝手中夺取政权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向，这就是1640年以后英法等国家相继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从此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整个欧美国家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2.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所谓“工业革命”指的就是第三个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是人类历史上继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之后又一次巨大的经济革命，其主要特征是机器代替人工，以蒸汽力代替人力和自然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文明产生后到工业革命前的社会都可以被看作是农业社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被称为工业社会。在这场革命中，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最为稳固和彻底的国家英国再次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策源地，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首先，爆发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

朝，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英国成为欧洲各国中资产阶级率先完成夺权任务的国家。虽然革命并不彻底，但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极大地限制了王权，以法律的形式宣布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新形成的两党和议会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必要的政治前提。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起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使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进入到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外部条件。例如，1689年出台的谷物条例，使土地贵族不得不以谷物出口的补贴来抵偿捐税提高和羊毛出口禁令造成的收益减少，从而迫使土地所有者尽快完成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转变；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保障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从而结束了行会对人身的垄断权。此外，英国统一的货币、税收和关税制度也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自由的竞争环境。

最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起步早，资本集中，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在市场模式的运作下，技术革新推广迅速，科学理论和思想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些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技术条件。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创立，伦敦成为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心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中一些重大的发明，很多都是首先在实验室中得到科学论证的。

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相仿，英国工业革命仍然是以纺织业中的一系列技术革新为先导。最初的动因是18世纪初出现的纺与织之间的严重失衡，甚至出现了“纱荒”，导致制造行业不得不停工待料，于是引发了一系列革新，简单地讲，就是织布机的革新推动

纺纱机的革新，纺纱机的革新反过来又带动了织布机的革新。

1733 年，工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织机上的经线得以自由往返，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倍以上。但飞梭的迅速推广很快导致了严重的“纱荒”现象。1751 年，英国皇家学会悬赏征求“发明一架同时能够纺 6 根棉纱而只需要一人照顾的机器”。1764 年，兰开夏的纺纱工人兼木工哈格里夫斯设计出一种多锭纺车，以他的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机”。这种机械是在一个长方形木机的框架上装置一排垂直的锭子，最初为 8 个，后来逐渐增加到几十个。但是，“珍妮机”仍然依靠人力，而且只能纺出做纬线的软线，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769 年，理发师出身的阿科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用水流推动，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但缺点是纺出的线粗细不均。1779 年，兰开夏工人克隆普敦把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结合起来，研制出一种走锭精纺机，称为“骡机”，它能够带动 400 个纱锭，纱线精细。

纺纱技术的进步又对织布业造成了压力，因此迫切需要高效的动力织机来消化过剩的棉纱。1755 年，卡特莱特在木匠和铁匠的协助下，制造出一架动力织布机，能够替代 40 个织工的劳动，使生产效率提高了 6 倍。后来，卡特莱特的动力织机又被加上了蒸汽的动力推动，这使大规模的绵织厂的建立成为了现实。

在动力机的发明和推广中，煤炭工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发明是最关键的环节。煤炭工业是英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蒸汽机最先在煤炭工业中取得突破。17 世纪伽利略、帕斯卡尔等人对真空和大气压的研究首先为蒸汽机的发明创造了理论上的基础。1711 年，铁匠纽科门研制出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蒸汽泵，在一个矿井中用于抽排巷道积水。但是这种蒸汽机存在燃料消耗过高和效率太低的致命缺点，因此不能得到广泛的应

用。1765 年,早年曾经在工场中学习铸造模型的苏格兰人瓦特在他大学朋友的协助下发明了一种改良型的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克服了纽科门蒸汽机的缺点,开始在煤矿开采业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的煤炭产量也得以在 18 世纪末期大幅提高。

蒸汽机的改良及其在更大范围的应用又带动了英国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支柱型产业的全面发展。1760 年,维尔金森首次把瓦特蒸汽机用于冶铁中的熔炉鼓风,极大地降低了燃料的消耗。此后,铁的产量迅速增长,成为英国继煤炭之后又一大出口产品。冶铁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铁制车床的研制,这标志着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开端。1814 年,史蒂芬森用瓦特蒸汽机制造出第一个火车头,在舍尔尼沃斯煤矿试运行,拽行 8 节货车,每小时行驶 8 英里,预示着一个铁道交通时代的到来。

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标志着英国已经从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

英国是早期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的技术和经验成为其他欧洲国家效仿和学习的对象,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纷纷派出专家到英国考察,英国的技术人员也被邀请到这些国家担任技术顾问。后来,这些后起的国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优势工业部门。工业革命朝着广泛和纵深方向进一步发展。从 19 世纪初开始,法国、美国、德国相继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各种原因,发展速度远不如英国。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和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垄断着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品市场,成为“世界工厂”。1846 年,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87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32%,煤和铁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50%,对外贸易额相当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总和,

此外英国拥有的商船吨位高居各国之首，伦敦成为世界惟一的国际金融中心。

工业革命也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在英国，工业革命造就了第一代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同时，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日益恶劣，工会组织出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使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东方，这种超越既可以归功于诸如工业革命这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大肆侵略和掠夺的结果。19 世纪上半叶，正处于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亚洲古国的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殖民掠夺。世界经济版图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 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互动

资本主义文明一经产生，就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亚非拉国家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奴隶贸易，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国家，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殖民掠夺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之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到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又迎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机器的采用、铁路的通行、汽船的行驶、电报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人口的增长、大城市的涌现，这一切都表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资本主义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必然导致

其向世界其他地区肆无忌惮地侵略和扩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古老的东方文明无一例外地相继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廉价的商品和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印度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从16世纪开始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600年，英国以保护它设在印度的一些商馆为名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从此成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进行经济侵略和殖民掠夺的主要机构。1757年，英国用武力征服了印度、孟加拉等地，到19世纪40年代，直接控制了全印度大约3/4的土地和2/3的人口。印度不仅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成为英国向中国和东南亚进一步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基地。

征收高额的土地税是东印度公司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英国迫切需要从印度获取大量的原料和粮食。1883年，英国国会通过决议，允许英国人到印度占有土地，直接经营种植园。从此，许多英国人到印度经营种植园，种植棉花、黄麻、茶叶、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在印度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重要的原料输出地的同时，英国还变本加厉地向印度倾销其廉价的工业品，想方设法地抑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19世纪以前，印度曾经是一个棉纺织品出口大国，印度的家庭手工棉纺织品在世界很多国家享有盛誉。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的棉纺织品在印度销售量的不断上升，印度反而成为了英国棉纱和棉纺织品最大的倾销市场。印度自身棉纺织业的萎缩和衰落是必然的。不仅是棉纺织业，印度其他传统的手工业部门都经受不住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冲击而纷纷倒闭。此外，英国殖民者还垄断了鸦片、食盐和酒的专卖，大量的利润流入英国殖民者的腰包，而留下来用于印度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费用却少得可怜。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民族工业举

步维艰。但与此同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在客观上加速了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对印度的近代化进程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英国对整个印度的征服结束了之前的封建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外,铁路的修建、银行的建立、货币的统一、通讯的发展,都为印度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早就觊觎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商人就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贸易活动。但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中英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英国对华贸易基本上是贸易逆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社会阶段,英国的毛纺织品以及其他小工业品对于男耕女织的中国来说没有多大市场,而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英国商人选择了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贸易。从1830年开始,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逐年增多,鸦片贸易不但改变了中国的贸易顺差的优势地位,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而且造成了烟毒泛滥,吏治腐败,军备松弛,民不聊生。清政府面对这种局面,制定禁烟的政策,派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大量从英商手中缴获的烟土。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在华的利益,以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损害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为名,在1840年不惜动用武力向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英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从此,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的天朝大国的大门,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逐渐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向附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中国被迫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国门,西方殖民列强在中国开办商埠,划设租界,划分

势力范围。继印度之后，中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掠夺和倾销商品的对象。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之下开始解体，同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艰苦历程。鸦片战争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一是实现工业化，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走上强国之路；二是赶走西方列强，恢复民族独立，只有如此，中国才能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出台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了兴修铁路、造船、开矿、设立银行等建议，可以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启蒙作品，这表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只有兴办资本主义实业才能够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实力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购置和引进西方的机器，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从此兴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武器、船舶、机器制造厂，开矿炼铁，建立电报局，史称“洋务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是为了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而发起的，而且成效甚微，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培养了一批人才，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872年到1894年，中国出现了纯粹的民办企业100多家，虽然受到本国官督商办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双重排挤，生产规模、资金、产量等方面十分有限，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步。

19世纪上半期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但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与荷兰商人接触较多的中下层武士要求改革，发展工商业，向西方学习。19世纪

初，日本也遭受到包括英国、美国、俄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和武力威胁，要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 年，美国舰队开进东京湾，是年 3 月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关、函馆，允许美国设立领事馆，享受最惠国待遇。此后，荷、俄、英、法等国纷纷效仿，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面对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殖民危机，1868 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决定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迅速改变日本的落后面貌，把日本建设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口号的引导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包括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实行土地和租税改革、扶植军事工业、废除关卡、整顿货币、奖励贸易等。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一两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最终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日本成为东方国家成功应对挑战的典型代表。

四 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生活

1.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实践

当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先后完成工业化从而真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仍然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和殖民活动一方面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打断了其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使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应时代需要并符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项共同任务。随着20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高涨，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之后，尽快使自己的国家完成工业化从而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任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这条寻求富强的道路并不平坦，往往充满了曲折和教训，但东方文明的再次崛起毕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腾飞正说明了这一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和奴役，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斗争，终于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道路。建国五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东方巨人在国际的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中既有令人振奋的飞跃，也有惨痛的失败和教训。

从建国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1956—1966年，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民经济曲折前进；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一定进展；1977年至今，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确定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国民经济进入稳步、健康和高速的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接管其在中国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剩下1000多家，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监督和管理，采取征用、代管、征购、管制等多种形式分别处理，这些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对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官僚资本，人民政府实行了没收的政策，之后对这些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部分经过改造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有步骤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提高了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固人民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利用三年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转向经济。三年恢复经济的措施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完全的恢复。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就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制定的。在“一五”计划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十分落后，中国的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印度，因此，“一五”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到1956年，“一五”计划的主要目标大都提前完成，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一五”期间工业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的发展成就，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探索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标志着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条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尽快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愿望，但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958—1960年，中国进入“大跃进”阶段，其主要特征就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修改和提高计划指标。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3年，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

调整，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66 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历时 10 年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为指导，使经济组织和工农业生产陷入瘫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针对以前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管理过于集中以及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的弊端，中央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人民公社制度，调整农产品的收购政策，并大力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下，改革的重点开始向城市和其他领域扩展。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整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全面开始，同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在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实施。1979 年，根据广东、福

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给予对外经济活动的优惠政策。1988 年，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1984 年，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 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泉州和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和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些地区到今天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成为吸引外资、出口创汇、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龙头。

1982 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把 20 世纪的奋斗目标由过去的实现工业化改为实现小康，这一实事求是的提法扭转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1987 年召开的十三大又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三步走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一步实际上在十三大召开时已经完成）；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步到现在也基本实现，一些地区也已经达到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富裕，基本实现工业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表明，中国人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完善。虽然中国经济从总体上讲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是世界所有文明中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而且，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表明她也将拥有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

2. 信息革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就在工业化浪潮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之际，较早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又迎来了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由于这次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应用和电信技术为先导，所以被称为“信息革命”。与人类历史上以前的两次革命，即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仿，信息革命也使生产力水平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引发了包括生物工程、空间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兴学科或技术的出现，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变。因此，从整个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史来看，有人把这次革命之后的世界称为“后工业时代”。虽然这场革命方兴未艾，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这次革命，但这毕竟预示了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确切地说，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和浩劫，但也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今天人们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汽车、飞机、电子计算机等最初都是在战争中被发明出来并首次使用的。战争是残酷的，是人们所恐惧和不愿意发生的，但战争在客观上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了一系列副产品，为人们在和平年代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这一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中所蕴藏的辩证法。

与此前的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相比，战后出现的这次新技术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和生活的应用上，都远远超过了前者。除了上面讲到的战争对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作用之外，战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也是发生新技术革命所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二战以后，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并且工农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从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了宗主国的束缚和奴役，取得了民族独立，持续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较早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际经济格局呈现出区域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掌握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成为各垄断资本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各垄断企业争相建立科研机构，加速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最后，各个国家对科技的财政支持和资金保障为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基础教育的大力投入和科研经费的不断提高就是这一趋向的集中表现。

从总的情况看，这次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美国，之后逐步扩展到西欧、日本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60年代进入高潮，70年代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在速度上曾一度减缓，但80年代以后又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新技术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新兴技术群上面：首当其冲的是信息技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代表的电子技术又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应用最广的产业部门，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相结合，又推动了通讯等领域的飞跃性发展，使人们从机器时代进入到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地球变小了，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越来越便捷和频繁。在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计算机技术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迅速普及和应用更是结出了累累硕果。例如，生

物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体现出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又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

与以往的科学革命相比，发生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这场新技术革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科学和技术能够紧密结合，科研成果可以迅速得到应用，新技术能够很快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产生明显的效益，现代人几乎随时都能够感觉到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二，新技术革命与其说是局限在某一两个部门（比如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动力和产品加工部门），不如说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通讯、邮电、能源、化工、服务等行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部门都是新技术革命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控制技术把社会生产带入了自动化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体力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比例迅速下降，大量的从业者转向第三产业。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在同一生产领域的分工与合作日益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3. 当代世界经济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战后出现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更是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总体面貌，也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十分明显的特征。

首先，与战前相比，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

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跃出了一国的范围，并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局面。同时，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兴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两种制度、三种力量的错综复杂关系塑造了当代世界的基本格局。

由于远离欧洲战场，并且大发战争横财，美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霸主。二战后，一些东欧和亚洲国家纷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形势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暂时遭到挫折，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调整了发展思路，社会主义经济又呈现出蓬勃生机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从 1945—1980 年之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州相继有 90 多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宣告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虽然这些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的破坏，经济比较落后，但民族独立让存在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体系瓦解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打击。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民族独立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和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迫使垄断资本不得不借助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参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扩大、国家财政预算的扩大等方面；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和资本越来越超出一国的范围，出现了资本国际化的趋向，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卡特尔在世界

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二战以来就已出现的经济一体化现象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依赖性的加强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经济的一体化或全球化可以分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两个层次，前者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建立为主要形式，后者则表现为世界各国所共同遵守的经济规则日渐形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种国际组织中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五 展望未来

通过前面粗线条的勾勒和画龙点睛式的叙述，我们已经走过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人类经济生活史。可以说，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生活是人类其他一切创造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既是一个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区域不断扩大，文明由最初的一个点逐步扩大到面，同时，各地区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虽然其中既有和平交往，也有暴力和冲突，但超越本地区的局限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走向合作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纵观人类整个经济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这些启示将把我们引向未来，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前进。

首先，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我们人类本身就来自于自然，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受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塑造了不同的文明风格和文化景观。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人类不再甘当自然的奴仆，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环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自然也遭到了无情的破坏，人们开始自高自大，以为万物之灵可以完全摆脱自然的束缚，超越自然的规律，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生存环境的破坏使人们离梦中的家园越来越远。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尊重自然的规律，也会得到自然的馈赠；违反自然的规律，也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其次，由于交通条件、地理知识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局限，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之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相互隔离的闭塞状态，人们对异域的文明总是充满了不信任、偏见甚至敌意。公元1500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整个世界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变小了，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互相尊重、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虽然在现在，地区冲突、种族仇杀、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最后，几千年来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在自然科学进步的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步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翼和双轮，单向的发展只能造成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灾难，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性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不论人类的经济多么发达，物质生活多么丰富，我们也不要忘记——科技要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2. 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开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3.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4. 刘仲藜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5.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6.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7.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8. 田昌武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4 卷),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 1996 年版

9.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0.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后　记

《文明史系列读本》24册，是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第五份研究成果。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于1996年由万邦泛亚集团董事长曹慰德先生创立于新加坡。曹先生出生于香港的中国传统家庭，少年即赴北美接受西方教育，后就读于美国密西根大学船舶工程系，获工程学硕士，深受西方思维范式的影响。毕业后，到亚洲从事工业与航运业务领导工作。

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曹先生目睹了东西方社会的种种现代病：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个人利益至上，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人的价值伦理的异化，导致人与自我关系的不和谐。

面对此情此景，曹先生作为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深深感到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进程和现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也赋予了企业家和商人巨大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和商人有义务积极参与到文化转型和重建中去。只有文化与社会、经济、技术同步协调发展，人类迅速改变旧的价值伦理观，重建新的思维范式和宇宙自然观，才能使全球化进程的冲突和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曹先生尤为关注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他认为，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史。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在不断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同时认识了人类自身，并不断地升华了自己的历史，因而也是一部人的发展史，是人的永无止境的奋斗史。

曹先生还认为，文明应是双全的，即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尤为重要，

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它还引导物质文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曹先生主张，为达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综合东西方的智慧，特别是要借用东方智慧中的阴阳平衡的学说指导和调节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以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首先要以诚为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懈地探索、观察、思考，不断取得人类与万物、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最大和谐和互让；其次，要自觉调整人类的行为方式、方向、步伐和策略，积极地、创造性地把人类文明引向最佳发展趋势；再次，动态平衡是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一个原则和方法，即在发展和变化之中去纠正种种偏差，达到动态中的平衡；还有整体依存的原则，它是经过创造达于和谐之后，在保持文明的多样性的前提下的统一的人类目标，达到“万物并肩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境地。

《文明史系列读本》在各位作者历经三年的辛苦努力下，终于面世了。值此之际，特别要感谢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家和先生，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对我们进行教诲，大家受益匪浅，对我们完成此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成这样一本内容宽泛、道理深刻又通俗易懂的文明史，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书中肯定会有很多不完善和疏漏之处，我们诚恳地敬祈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 年 12 月 30 日

责任编辑 / 邹桂芬 王清　装帧设计 / 田戈

文明史系列读本

《人类自我认识的哲学思考——自我与文明的转型》
《人类诞生的胚基——自然史》
《人类对天象的解析——古代术数史》
《人类对超自然的崇拜——宗教史》
《人类智慧的创造——科学技术史》
《人类对生命的研究与拯救——医学史》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环保史》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史》
《人类古代商业活动中的东方之子——中国商人》
《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政治史》
《人类的自律与他律——法制史》
《人类社会的调控——管理文化史》
《人类的理性之光——思想史》
《人类道德的升华——修身兼性史》
《人类心灵的宣泄——文学史》
《人类交流的工具与符号——汉文字史》
《人类情感的表达——艺术史》
《人类灵魂的塑造——教育史》
《人类交往史的重要组成——中外交流史》
《人类信息的沟通——传播史》
《人类心灵的原体验——爱的历史》
《人类社会形态最基本的内容——社会生活史》
《人类社会的细胞和纽带——家庭婚姻史》
《人类不同文明的互动——文明冲突与交融史》

ISBN 7-216-04932-2
9 787216 049320 >
丛书总定价:135.00元(全24册)